

诚信: 诚以养德 信以立身

蒲宏凌

诚信是人类社会普遍的道德要求,是个人立身处世的基本规范,是社会存续发展的重要基石。把诚信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之一,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,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纽带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不仅形成了诚信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,而且铸就了诚信的心理趋向和道德传统。



① 内诚于心, 外信于人

早在先秦时期,诚信的观念就已经深入人心并得到充分讨论。据《逸周书》记载:“父子之间观其孝慈,兄弟之间观其友,君臣之间观其忠惠,乡党之间观其诚信。”此处“信诚”,意同“诚信”。邻里乡党之间的交往,需要诚实守信的道德品质,真诚相待,讲求信用。《周易》也说:“君子进德修业。忠信,所以进德也;修辞立其诚,所以居业也。”君子的修身之道,也离不开“诚信”二字。

诚于中,信于外。在传统的哲学思辨中,诚与信既相关的范畴,又有不同的内涵。简单来说,诚,关注内在自觉,是内圣之道;信,注重外在实践,是外王之道。诚信作为道德规范,实则合乎内圣外王的哲学理路。

先来看“诚”。《大学》提出“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条目,又反复论说,“欲正其心者,先诚其意”“意诚而后心正”,而正心诚意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。在这里,诚是修养方法。同时,诚又是道德境界。《中庸》说:“诚者天之道也,诚之者人之道也。”又说:“唯天下至诚,为能尽其性;能尽其性,则能尽人之性;能尽人之性,则能尽物之性;能尽物之性,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;可以赞天地之化育,则可以与天地参矣。”儒家认为,人道本于天道,只要努力追求诚的境界,上合天心,进而就可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。孟子也说:“是故诚者天之道也,思诚者人之道也。”又说:“万物皆备于我矣。反身而诚,乐莫大焉。”与天地同参,与万物同体,这正是儒者所孜孜以求的精神境界。

再来看“信”。“信”往往着眼于人际交往中的重诺守信。《尚书》说:“尔无不信,朕不食言。”《诗经》说:“慎尔言也,谓尔不信。”这两句都是说言而有信,取信于人。孔子教授学生,有“文、行、忠、信”四教,要求“与朋友交则信”。《论语》中多次提到关于“信”的教诲,比如“敬事而信”“谨而信”“主忠信”“朋友信之”“信以成之”“信则人任焉”“信则民任焉”等。董仲舒认为:“竭遇写情,不饰其过,所以为信也。”他将信与仁、义、礼、智并列为“五常”,既是行为规范,又是道德准则,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。

② 不信不立, 不诚不行

那么,何为诚信?古人认为,诚、信二字可以互训。《说文解字》说:“信,诚也。从人从言。”又说:“诚,信也。从言从成。”《白虎通》也说:“信者,诚也,专一不移也。”诚信即是表里如一,言行如一。朱熹认为:“诚者,真实无妄之谓。”程颐认为:“以实之谓信。”诚信就是要诚实守信,重规则,守契约,言必信,行必果。

《管子》有云:“诚信者,天下之结也。”诚信是治国理政的关键所在。《吕氏春秋》进一步论述说:“君臣不信,则百姓诽谤,社稷不宁;处官不信,则少不畏长,贵贱相轻;赏罚不信,则民易犯法,不可使令;交友不信,则离散郁怨,不能相亲;百工不信,则器械苦伪,丹漆染色不贞。”诚信缺失的危害极其严重,国家动荡不安,社会秩序混乱,经济凋敝,人人自危。孔子也认为,治理政事的要点在于“足食、足兵、民信之矣”,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,宁可去掉兵力和粮食,也不可失去人民的信任,否则国家也就立不起来了。对于个人而言,诚信也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。孔子说:“人而无信,不知其可也!”他又说:“言忠信,行笃敬,虽蛮貊之邦行矣。言不忠信,行不笃敬,虽州里行乎哉?”

需要指出的是,诚信要以固执善道、止于至善为依归,否则就会走向固执己见、是非不分的反面行径。《中庸》说:“诚者,天之道也,诚之者,人之道也。”又说:“诚之者,择善而固执之者也。”又说:“诚身有道,不明乎善,不诚乎身矣。”君子的进德修业之道,就在于择善固执,死守善道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孔子才说:“言必信,行必果,硁硁然小人哉。”孟子说:“大人者,言不必信,行不必果,惟义所在。”荀子也说:“君子养心莫善于诚,致诚则无它事矣,唯仁之为守,唯义之为行。”对这一问题的看法,儒家是一以贯之的。

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诚信建设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,要把诚信作为现代社会文明之基,不仅要弘扬传统的“诚信”美德,更要大力推进以个人为基础、企业为重点、政府为关键的现代“信用”建设。在全社会牢固树立个人无信不立、企业无信不旺、政府无信不威、国家无信不强的观念,使现代诚信意识深入人心,成为全社会自觉的行为规范。党的十八大报告也指出,要倡导诚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,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,加强政务诚信、商务诚信、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。诚信中国的建设,要求每个人都将诚信作为言语行动的基本规范,内化于心,外化于行,贯彻和落实到实践层面,真正构建起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。

(作者就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室)
(本文配图来自网络)

□ 中国民间工艺

葫芦上的雕刻艺术

——访新疆工艺美术家马江红

本报记者 卢泽华



马江红的葫芦雕刻作品(敦煌石窟萨埵太子舍生饲虎图)

一间暗室、一排长桌、一把刻刀、一组展柜……来到新疆雕刻艺术家马江红的工作室,气候的炎热,城市的喧嚣,瞬间都被涤荡一空。

“从小到大都不敢想象我竟然与克孜尔壁画和葫芦雕刻结缘。”谈到自己这30多年艺术生涯,马江红的脸上依然洋溢着热情。

马江红生于新疆,父母是当地的普通公务员。在她的少年时代,马江红不顾父母反对,坚持选择了去新疆师范大学工艺与美术学院就读。马江红与壁画结缘源自大一那年她去敦煌实习的经历。“我被这些埋藏在沙漠里的艺术感动得热泪盈眶,尤其是那些色彩绚丽的线条和栩栩如生的故事。”马江红说。

后来,她又慕名去了克孜尔千佛洞。但这次的经历给马江红带来的却是失望和惋惜——这里的壁画要比敦煌早200年,但经过度劫掠和焚毁,佛洞里的古迹早已风化,几近消亡。

结束这次行程,马江红来到新疆喀什采风。此时,她看到一位雕刻葫芦的老艺人,这给马江红带来灵感——何不把克孜尔千佛洞的壁画雕刻在葫芦上,让这两种艺术形式碰撞出新的火花?

马江红花了600元,买了一个大葫芦,在当时,这可谓是一笔巨款了。刚开始雕刻,她的小拇指常常被刻刀削得鲜血淋漓,但每次等伤好之后,马江红重新拿起刻刀,继续雕刻。

相对于平坦的纸面和墙壁,葫芦不规则的流线形体和弧面对行笔走刀构成了相当难度。为了丰富和完善艺术技巧,马江红先后到北京、扬州等地学习版画、木刻、玉雕等传统技法,并很快将它们融入到葫芦雕刻里。

马江红的作品大多取材于佛教洞窟壁画,其中,克孜尔千佛洞的壁画对她影响最深。为恢复这些濒临失传的壁画,她大量收集各国所藏的克孜尔壁画图片。同时,马江红并不满足于简单临摹这些壁画。“一味地临摹没有意义,每一件葫芦都应是创新的艺术作品。”马江红说。

在马江红的心里,一直存在着一个遗憾。

这还要从8年前说起。2008年,马江红带着她的14件作品来到北京798艺术区举办展览。在展览上,一位收藏家提出购买她的这些作品。当时的马江红正苦于没钱采购专门用以雕刻的油葫芦,于是,虽然不舍,她还是答应对方的请求。

卖掉葫芦之后,马江红立刻后悔了。后来又花了几十年时间把这些葫芦重新创作了一遍。自此,马江红没再卖过一个葫芦。事实上,在如今的工艺品市场上,这些葫芦每件都价值不菲,但马江红始终不为所动。如今,虽然生活条件有限,但马江红也过得十分惬意。

不过,马江红也有自己的烦恼。

一直以来,她都想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人,合作开一家博物馆,来展示这些葫芦及其承载的文化。然而,不善交际的她始终没有为这个“博物馆计划”寻得合适的伙伴。同时,马江红越来越担心自己的手艺失传,她想寻找一个可以承衣钵的弟子,但目前也没有任何音信。

“对于葫芦雕刻,我正在寻觅有心学习、能够坚守的传承之人。如果有缘相遇,我会不忘初心,把毕生所学传授给他。”说到这里,马江红充满希望的眼神里夹杂着一丝落寞。



马江红在创作中

□ 汉字故事

五台山“灵峰胜境”匾额——

“峰”字暗藏康熙寻父秘密?

杨立新

2000年五一“黄金周”,单位组织我们去山西五台山旅游。沿着108级陡峭的石阶,我登上了位于灵鹫峰上的菩萨顶,只见迎面一座三门四柱七檐的木牌楼上,悬挂着“灵峰胜境”四个蓝底鎏金大字匾额。



五台山“灵峰胜境”匾额

由匾额上方镌刻的“康熙御笔之宝”玺印可知,“灵峰胜境”四字为康熙皇帝所题。其中“峰”字的写法与现行汉字有所不同,一是变左右结构为上下结构,写成了“峯”;二是“峯”字下部的“丰”,由三横变成了两横。

在现代汉字规范化之前,一些左右结构的汉字通

常可以写成上下结构。诸如:概一槩、胸一脢、期一朞、稿一稟、略一畧、毗一毘、棋一棋、群一羣、裙一裊、晰一晳、毗一脢,等等。“峰”字写成“峯”即属此例。但尤让人困惑不解的是,“峯”字下部的“丰”,不知为何少写了一横?

导游向我们介绍说,“峯”字少写一横,这是康熙爷在五台山上有意留下的错字。说起这个错字还与一段重大历史事件有关呢,那就是“清宫四大疑案”之一的顺治出家之谜。

接着,导游绘声绘色地讲解起来:顺治皇帝在他24岁那年便驾崩了,宫里传出的消息是死于天花,而民间却另有说法,认为顺治为情所困,到五台山出家当和尚去了。一次,康熙借来五台山拜佛为名,悄悄打听父皇下落,当行到灵鹫峰菩萨顶附近时,遇到一位仪表非凡的僧人。康熙便上前与他打招呼,僧人自称名叫“八叉”。下山后,康熙反复念叨着“八叉”,猛然醒悟:“父”字拆开,不就是“八叉”么?原来自己遇到的那个僧人就是父皇啊!康熙赶紧上山寻父,但“八叉”却不见了踪影。康熙甚感失落,故而在题写“灵峰胜境”时,有意将“峯”字下面的“丰”少

写了一横,寓意为“父子缘薄不相识,人生有憾难圆满”。

应该说,这段康熙寻父的故事的确很感人,但明显系好事者附会编造出来的。由匾额的款识我们知道,康熙题匾时间为甲戌年仲夏,即康熙三十三年的1694年,此时距康熙1667年亲政已过去了27年。康熙时隔27年再去寻父,显然与情理不合。事实是,从康熙二十二年(1683年)起,康熙皇帝先后5次巡幸五台山,瞻谒文殊圣像,赐题碑文匾额,把五台山佛教当成了怀柔蒙、藏等民族的工具,以达到安定统一的目的。另据史学家们精心考证,顺治皇帝确于顺治十八年(1661年)正月初七死于天花。再者,康熙所题的“峯”字根本就不是什么错字。

其实,古人在书写“峰”字时,下部的“丰”既可写成三横,也可写成两横(见下图)。如《圣教序》中王羲之写的两个“峰”字均为两横;康熙的书法受明朝大书法家董其昌的影响很大,董其昌的“峰”字也多是这样写的。

峯 峰 峯 峰 峰

(晋) (唐) (元) (明) (明)

王羲之 李邕 赵孟頫 文征明 董其昌

那么,“峰”字为何可以写成两横?由下面“峰”的字形演变可以看出,在甲骨文、金文中,“峰”字都是两横,甲骨文竖画下有一圆点;到了小篆才演化为三横。因此,这种两横的“峰”字可说是古文字的“孑遗物种”。

峰 峰 峰 峰

甲骨文

金文

小篆

另外,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就是,康熙御笔亲题的杭州西湖十景之一的“雷峰夕照”碑,其“峰”字的写法与五台山“灵峰胜境”匾额毫无二致。按照导游的上述逻辑,莫非康熙还曾到杭州寻父不成?看来,“峰”字这种写法完全是康熙个人的书写习惯,绝无任何深意可言,不可过度阐释。



杭州西湖“雷峰夕照”碑